

影響中共以黨領軍的兩次會議 —以三灣改編會議及古田會議為例

許哲維

陸軍官校總務處副處長

崔瀚中

國防大學軍事理論組教官

摘 要

中共於 1927 年 8 月 1 日由朱德、周恩來、賀龍、葉挺等人，發動南昌暴動，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並以南昌暴動這一天，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紀念日(建軍節)；之後於 9 月由毛澤東領導湘贛秋收暴動的工農革命軍進行三灣改編，對實現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也建立了中共的政治工作制度。1929 年 12 月中共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古田召開，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會議內容主要為律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基本制度和措施，也確立了中共建軍原則。而中共自 2012 年習近平上任以來，曾多次至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並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涵義即為重新喚起「以黨領軍」之思想。

關鍵詞：三灣改編、古田會議、以黨領軍

影響中共以黨領軍的兩次會議－以三灣改編會議及古田會議為例

Two Meetings that Influenced CPC Leading Military: A Case Study of the Sanwan Adaptation and the Gutian Conference

Zhe-Wei Xu

Vice Director, General Services, R.O.C. Military Academy

Han-Chung Tsui

Instructo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On August 1, 1927, Zhu De, Zhou Enlai, He Long, and Ye Wei launched the Nanchang riots, established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and announced August 1 as the Army Da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ianjun Festival). In September, Mao Zedong led the Xiangluo Autumn Harvest riots to carry out the Sanwan adaptation. It has laid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gainst the military and has also established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of the PRC. In December, 1929,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Fourth Army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was held in Gutuan, Shanghang county, West Yunnan. It adopted “the resolution of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Fourth Arm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drafted by Mao Zedong, namely the Gutian Conference. The content of the meeting was mainly to defin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inciple of leadership over the military, and to establish basic systems and measures politically, ideologically, and organizationally, and also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C’s army building. Since Xi Jinping took office in 2012, he has repeatedly held political

許哲維、崔瀚中

work conferences in Gutian and emphasized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military. Its implication is to reawaken the idea of "CPC Leading Military."

Keywords: Sanwan adaptation, Gutian meeting, CPC leading military.

壹、前言

2014年10月30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古田主持第一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此次召開的會議，是習親自提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¹，會議主要任務是，「貫徹整風精神，研究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的重大問題。」習強調，中共軍隊政治工作的時代主題是，「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習並強調：「堅持黨指揮槍²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強軍之魂，鑄牢軍魂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³ 2017年10月26日，習近平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軍隊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強調：「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而奮鬥。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貫徹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從嚴從緊加強軍隊黨的建設，保持政治整訓勁頭和力度，堅定維護國家戰略全局穩定。」⁴ 從上述事項可以看出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以黨領軍的重要。基於上述原因，本文將探討下列三個問題：

¹ 中共認為古田是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地方，也是政治工作奠基及軍隊定型的地方。習近平先後 7 次來到這裡，大力倡導和弘揚古田會議精神。《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2 日，〈

<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F%A4%E7%E4%BC%9A%E8%AE/AE/15992803>〉，(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² 「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確立和逐步完善起來的，《人民網》，2018 年 1 月 7 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5%9A%E6%8C%87%E6%8C%A5%E6%9E%AA>〉，(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³ 古田會議(2014 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2 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F%A4%E7%94%B0%E4%BC%9A%E8%AE/AE/15992803>〉，(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⁴ 〈習近平 2017 年 10 月 26 日出席北京召開的軍隊領導幹部會議〉，《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2017/10/26/ARTIXqZlAdd6Nfj3UXGUpDBE171026.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 1.中共黨史探討。
- 2.中共建軍過程探討。
- 3.「兩次會議」與「以黨領軍」思想關聯性探討。

貳、中共黨史及建軍過程概述

一、中共黨史概述

1917年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在俄國革命中奪取政權，對亞洲民族運動發生強烈影響，於是推行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畫，是時中國國勢積弱，俄共遂推選為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大好園地(蔡裕國，1988：1)。據中共黨史第一冊(上海、瑞金時期)乙書所述：「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俄共黨員小組維丁斯基(G.N Voitinsky, 1893-1956)⁵等人到達中國，會見了李大釗(1889-1927)和陳獨秀(1879-1942)等籌組共產黨(蔡裕國，1988：1)。」

中共最早的建黨發起組織，是陳獨秀於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齊、李達8人(王官德，2003：15)。並於同年11月，上海共產黨組職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一書提到：「1920年3月，李大釗和鄧中夏(1884-1933)等商定，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5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中共建黨做思想上合組織上的準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7)。」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在維丁斯基、陳獨秀及李大釗等人的倡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先後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等地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另在東京及巴黎成立了兩個旅外的共產主義小組(蔡裕

⁵ 維丁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俄裔猶太人。共產國際於創立初期有影響的人物，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曾為共產國際派駐於中國的代表，中國研究家。1920年2月，布爾什維克奪取西伯利亞後，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不久在此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人民網》，2018年1月22日，〈<https://cpc.people.cn/%E5%90%B4%E5%BB%B7%E5%BA%B7>〉(檢索日期：2018年11月25日)。

國，1988：51)。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⁶，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一書提到：「一大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⁷，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並規定黨的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12)。」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以及領導工人運動。自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方針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

從上述可知，中共的誕生乃是由俄共及共產國際的代表維丁斯基和馬林等人為執行俄共及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政策前來中國策劃、推動、指導、組織而成的(蔡裕國，1988：62-63)。

二、建軍過程

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實踐的主要內容，是與國民黨合作建立新制度的軍隊；1924年6月黃埔軍校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活動的開端。(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中國共產黨依照蘇俄紅軍建設的經驗，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並於黃埔軍校和革命軍建立了國民黨特別黨部、黨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5)這三個制度，特別是黨代表⁸和政治部制度⁹，毛澤東曾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1924年到

⁶ 中共一大開幕日期是中共建國以後根據檔案查證清楚的，閉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在此以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規定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對一大的開幕日期難以查證，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1。

⁷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共有15條，但英、俄文譯本均缺第11條，因此實際僅有14條，其內容要只有三：一、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二、確定黨的綱領為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推翻私有資本，建立社會公有制，並強調要加入共產國際。三、確定黨的組織制度和機構是以列寧的建黨原則為指導，是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有嚴格紀律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黨。蔡國裕著，《中共黨史第一冊－上海、瑞金時期》，頁59-60。

⁸ 黨代表制度模仿蘇俄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先在黃埔軍校實行，後國民革命軍的軍一級也普遍實行，它代表國民黨監督同級軍事長官行使軍權，規定凡呈請、命令、通告和指揮事

1927 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耳目(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88：380)。」

1924 年 10 月，中共廣東區委從平定廣州「商團軍」動亂的鬥爭中，認識到有必要為統帥部建立一支機動分隊。在孫中山的支持下，於 1924 年 11 月組建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¹⁰，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正規部隊。1925 年 11 月，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在征得國民革命軍第 4 軍軍長李濟深的同意後，在廣東肇慶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 4 軍第 34 團(1926 年 1 月改稱獨立團)，共產黨員葉挺任團長，中共亦稱其為葉挺獨立團¹¹。

1926 年 7 月 15 日，汪精衛(1883-1944)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做出了「分共」的決定，並對共產黨員實行屠殺，共產黨員的數量由近 6 萬多人銳減至 1 萬多人，工農會員只剩下 10 萬多人，農民協會全被取締了(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11)，中共 1925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遭到慘重失敗，中共中央臨時常委迅即決定實行武裝反抗，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58)。南昌暴動是中共以武裝力量反抗

宜，均須黨代表附屬才有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5-6。

⁹ 政治部制度先在黃埔軍校實行，後在國民革命軍師以上各級實行，為司令部下屬單位，與參謀部(處)並行，受同級黨代表指導，對內負責官兵的政治訓練，對外宣傳、發動民眾，團一級設政治指導員，履行政治部職能。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 6。

¹⁰ 1924 年 10 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等人從平定商團的鬥爭實踐中，雖然有很大進展，但工農武裝力量是分散的，共產黨還沒有掌握正規軍隊的指揮權。中共廣東區委鑒於粵漢等鐵路經常被軍閥、土匪騷擾，便向孫中山提出建立一支以保護大元帥府安全和鐵路安全為基本任務的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1924 年 11 月底，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正式成立，全隊有 150 人左右，也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一支革命武裝。《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2 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9%93%81%E7%94%B2%E8%BAD%6%E9%98%9F/10358413>〉，(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5 日)。

¹¹ 葉挺獨立團，全團 2100 人，團內建立有直屬中共廣東區委軍委領導的黨支部，各營設有黨小組。連以上軍官大部分是來自黃埔軍校和鐵甲車隊的共產黨員。這個團編制列屬第 4 軍，但幹部和人員補充均由中共廣東區委負責，是大革命時期惟一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一支正規軍隊。《人民網》，2014 年 11 月 2 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127%E5%B8%88/7567055>〉，(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5 日)。

政府的肇始，1933年7月11日，中共蘇維埃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八一」為中共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後來成為中共解放軍的「建軍節」，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王官德，2003：97)。

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¹²和賀龍、葉挺、朱德(1886-1976)、劉伯承(1892-1986)等領導下，發動南昌暴動，佔領了南昌。這次起義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的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創建中共軍隊的新時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59)。8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會中指出，「今後黨的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¹³毛澤東認為用槍桿子奪取政權和用槍桿子鞏固政權的鬥爭實踐，為「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發展提供充分思想泉源。

三、中共建軍初期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於初期的建軍經驗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大革命時期與國民黨合作，在雇傭制基礎上創建新制度軍隊的經驗，其二，俄國十月革命的先以武裝起義奪取國家政權，爾後以起義的武裝力量建立國防軍的經驗(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6)。筆者認為這兩種經驗都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共產黨創建軍隊的需要，但又都影響於中國共產黨創建軍隊的實踐，首先是影響到中共中央的建軍設想。

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的「軍事工作大綱」中，對中共紅軍的建設問題

¹² 前敵委員會，又稱「前線委員會」。簡稱「前委」。是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革命戰爭時期，為組織領導某一地區的武裝起義或重大戰役而設立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於192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李立三、譚代英、彭湃組成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組織領導南昌起義。於抗日戰爭時期，也組織過前委。解放戰爭時期，除在野戰軍組建前委外，還在一些重大戰役中組織了總前委。《人民網》，2014年11月2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9%8D%E6%95%8C%E5%A7%94%91%98%E4%BC%A>〉，(檢索日期：2018年11月26日)。

¹³ 筆者認為1927年9月秋收起義，毛澤東開始了「在槍桿上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鬥爭實踐；1927年毛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開始用槍桿子奪取政權建設政權；對日抗戰時期，毛從兩個方面深化了「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思想。王朝彬著，《毛澤東政權思想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頁17。

提出：(一)原則上必須在團一級建立共產黨支部，連一級建立支分部。(二)應由蘇維埃政府派出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為黨的代表，任黨的支部或支分部書記，監督軍官，並負責進行政治工作，負責士兵的政治教育。(三)必須特別注意政治工作。紅軍的士兵不僅為戰鬥員，而且應為戰地宣傳組織人員。(四)紅軍的編制，必須從武器數量和作戰需要出發；紅軍的訓練以戰鬥之必要技能為主，一切不必要的訓練應盡量減少(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7-48)。

中共中央的這些設想還僅僅是一些原則，但多數原則對中共而言是正確的，也對各地中共紅軍的創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怎樣建設中共紅軍已是共產黨的工作，在中共中央提出建軍的一些原則設想的同時，中共於各地遇到了建軍的許多具體的實際問題，迫使他們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解決。其中，毛澤東領導中共紅軍的建設經驗最具代表性，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共藉由「三灣改編」，為無產階級領導下新型中共軍隊奠定基礎，並建立其政治工作制度。

參、兩次會議與建軍思想關聯性探討

一、「三灣改編」歷史背景概述

中共紅軍在展開游擊戰爭創建農村根據地的同時，開始了軍隊的建設。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進行「三灣改編」，在實踐中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型中共軍隊奠定了基礎(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8)。

1927年9月毛澤東和湖南省委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參加暴動的主力有原國民黨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的農軍，湖北崇陽、通城的部分農民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等。暴動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共五千餘人。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易禮容任行動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總指揮。但由於中共紅軍在戰鬥中相繼失利。毛澤東迅速命令部隊第一、三團與第二團餘部，到瀏陽的文家市集中，並於9月20日帶領部隊撤離湘東地區，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9月29日，中共部隊到

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部隊人數不足千人，軍心浮動不安，中共前敵委員會為能適應戰鬥的需要，對部隊進行整頓，決議於 30 日進行部隊改編，經過此次改編，中共已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使連隊得到充實；同時，在部隊建設上採取了「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新的共產黨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三項重大措施，毛澤東後來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50)。」三灣改編，從組織上開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也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中共軍隊的基礎，在中共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筆者認為，這次改編的特點有二：一、在團、營兩級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委員會，連建立支部，負責領導(分)隊，執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賦予的任務，並且積極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逐步做到排、班建立黨小組，以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二、實行新的共產黨代表制度，以共產黨代表擔任同級黨組織書記，擁有與同級軍事長官同等權力，分工負責官兵政治思想教育，領導官兵展開思想工作和群眾工作，協助軍事長官管理和指揮部(分)隊，並負中國共產黨務工作責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9)。

另外，這次改編還規定：「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2)。」為了保障士兵民主權利的履行，中共部隊連以上各級建立由士兵選舉的代表組成的士兵委員會，參與中共部(分)隊的經濟管理和行政管理，並在共產黨代表的領導下，兼做政治思想工作和群眾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制度也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新制度，三灣改編，確立了官兵一致的新型中共軍隊的內部關係。毛澤東曾評價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2)。」上述的這些制度的實行，使連隊開始有了群眾性的思想工作，並參加了對群眾的宣傳工作。

1928 年 4 月井岡山會師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提出的中共紅軍建設制度，隨即在中共紅 4 軍全軍實行；1929 年 3 月以後，中共中央將中共紅 4 軍的建設經驗推薦給散佈各地的紅軍，並規定將中共黨代表改稱為政治委員(後來，連政治委員改稱為政治指導員)。自此以後，中共紅軍的政治工作

制度便基本建立了，筆者認為三灣改編的影響，一方面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紅軍的領導，另一方面也從實際上確立了政治工作成為中共紅軍生命線的重要地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3)。

基於上述，這樣的改革對中共紅軍產生重大的變化，它使中共軍隊的連以上建立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代表制度，也與國民黨軍的相應制度不僅有本質上的不同，而且在職能上也有重大差別如下：

(一)改變了原本國民黨軍的特別黨部制度和黨代表制度的關係，將兩個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突顯出共產黨的領導作用。

(二)改革了國民黨軍特別黨部制度的消極約制。

(三)將國民黨軍代表與同級軍事長官的監督和被監督關係，改變成為同在共產黨的委員會領導下的關係，把個人監督改變為由共產黨委員會的集體領導，改革後的新制度，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紅軍的領導(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49-50)。

二、「古田會議」歷史背景概述

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是在中共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此一會議通過的決議，成為中共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歷史文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5)。它把馬克斯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僅確立了中共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同時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紅軍，建設成為一支服從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服務於中國革命鬥爭的新型中共軍隊的重大問題，對中共軍隊建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54)。

具體而言，古田會議的召開，是中共紅軍建設實踐發展的結果。當時，中共紅軍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的環境，紅軍的主要成分又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反映到中共紅軍隊伍中。紅軍的官兵，特別是軍事長官，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舊軍隊，這是中國長期以來歷史文化所產生的結果。雖說他們在革命鬥爭中忠於中國共產黨，但也不自覺地帶著舊軍人的單純軍事觀點等種種觀念(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5)。在中共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時，又產生了極

端民主化的傾向，部分中共軍隊的官兵不習慣於做創建根據地的艱苦工作，不習慣中國共產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原則，不習慣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他們認為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紅軍的領導，實行集權制，是「家長制¹⁴」；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工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他們不主張創建根據地，而主張四處游擊。這些不同認知，在中共紅 4 軍黨內引起了爭論。

基於上述，1929 年 6 月下旬，中共紅 4 軍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求解決爭論問題。但由於缺乏正確的政治觀念，會議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造成不良後果。它否定了毛澤東的必須反對流寇主義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制領導原則等意見，助長了忽視根據地的觀念和極端民主化；不經中共中央許可，解除中央指定的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迫使毛澤東離開中共前委領導崗位。此後，又召開中共紅 4 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但仍未解決問題(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5)。

針對中共紅 4 軍黨的七大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於 8 月 21 日致信中共紅 4 軍前委予以批評，並且指出：紅軍不僅是戰鬥隊，而且更具有宣傳群眾的政治作用，紅軍游擊戰，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紅軍中的共產黨應當實行集權制領導原則，絕不容許極端民主化，強調紅軍的政治工作和宣傳組織，「是中共紅軍中政治命脈」，決不能動搖這一「根本路線」(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5)。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¹⁵」，信中明確

¹⁴ 家長制是指在共產黨內生活中，由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凌駕組織之上，獨斷專行。黨內家長制作風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得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毛澤東晚年的家長制作風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人民網黨史百科》，2017年6月26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312.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6日)。

¹⁵ 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發出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致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該信肯定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確認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明確規定紅軍由前委指揮，並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其職責是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政治領導、部署命令等；要求紅四軍官兵維護朱、毛領導，並明確律定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人民網》，2016 年 5 月 26 日，〈<https://cpc.people.com.cn/item/%E4%B9%9D%E6%9C%88%E6%9D%A5%E4%BF%A1>〉，(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6 日)。

指示中共紅 4 軍前委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一是「發動群眾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是「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是「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並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共前委指導機關，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另外中共紅軍中右傾思想，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中共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皆原於中國共產黨的教育缺乏。中共中央還讓陳毅帶著「九月來信」返回中共紅 4 軍，請毛澤東重回擔任中共前委乙職。中共中央的這些指示，特別是「九月來信」的精神，為中共紅 4 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思想提供了依據。

1929 年 11 月 26 日，毛澤東回到中共紅 4 軍前委，在朱德、陳毅的協助下，於 12 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中共紅 4 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總結了中共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設經驗，糾正中共紅 4 軍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書記的新的中共紅 4 軍前委，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總結了中共紅軍建立以來破除舊軍隊影響，進行新型中共軍隊建設的經驗，確立了中共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其主要的內容是：(一)中共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決議指出，必須行中共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多的教育，劃清中共紅軍與國民黨軍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二)中共紅軍必須執行打仗、籌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三)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中共紅軍存在的意義。因此，中共紅軍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

中共紅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決議強調，中共紅軍必須實行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共產黨內教育，以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路線教育廣大共產黨員，提高共產黨內的政治水準，使共產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6)；決議並指出，「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中共紅軍中共共產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必須健全連隊以上各級共產黨的領導中樞；在共產黨內，應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應當嚴肅共產黨的紀律，反

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中國共產黨與軍事分離」、「中國共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

中共紅軍為了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工作，規定中共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中共紅軍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中共前委指導下，平行地執行工作」的關係。在組織上，把中共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中共紅軍的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應當積極展開，加強對官兵的政治訓練提高官兵的階級覺悟，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保證中國共產黨路線的貫徹執行和各項任務的完成(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97：56-57)。

「古田會議」決議，還對中共紅軍共產黨的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等具體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要求。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問題上，決議從組織建設和共產黨內教育兩個方面提出要求，強調必須健全各級組織，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係，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共產黨的下級機關和共產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瞭解指示和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辦法。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強調必須加強共產黨內教育，提高共產黨員的質量，增強共產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7)。

「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共軍隊的根本原則。它不僅推動了當時中共紅軍建設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而且以新的經驗驗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軍學說，成為中共軍隊建設的綱領(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7)。

三、兩次會議與毛澤東軍事思想關聯性

如前文指出，1927年9月29日，當中共工農革命軍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部隊人數尚不足千人且軍心浮動不安，中共前敵委員會為能適應戰鬥的需要，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同時，在部隊中建立起中共黨的組織，落貫落實連有支部，營、團有共產黨委

之要求，還規定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等措施，此即為中共黨史所稱之「三灣改編」，是中共建設無產階級領導軍隊的重要開端(王官德，2003：98)。中共全軍由毛澤東領導中共前委，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紅軍的領導。

另外，根據王官德、劉承宗、李化成合著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指出，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九月來信」，予中共紅4軍前委，指示中共紅軍的基本任務為：第一、發動群眾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第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第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周恩來，1980：33)。中共提出要設立政治委員制度，明確政治與軍事工作的關係，堅持實行民主集中制，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共前委指導機關」，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中共中央還要求朱德、毛澤東團結合作，指示毛回中共前委任職。

毛澤東雖在當時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但那時尚只是在實踐上，而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是根據中共紅四軍當時存在的問題，確立的政治建軍的原則，鑄就了共產黨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政治建軍的核心要義，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另外，共產黨強調必須確立在中共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共產黨的組織。這次會議中所確立的建軍基本原則，是中共建軍史上一個要的里程碑，提供中共建設一支無產階級性質、具有嚴格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重要綱領(王官德，2003：115-116)。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8月中共在「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重申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也指出共產黨員不應爭個人的兵權，但是要爭黨的兵權，爭人民的兵權，要懂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個道理(潘進章，2015：38)。2012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強調，「確保全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要堅持從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幹部，使槍桿子始終掌握在終於黨的可靠的人手上(潘進章，2015：39)。」由此可見，「槍桿子」是中共政權的支柱，習近平仍需要依靠黨對軍隊的掌握，軍隊對黨的效忠來作為其政治前途的保障。中共於2018年1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河北省保定舉行2018年開訓動員大會。在此動員大會上，

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向全中共軍隊發布訓令新春開訓動員大會，習說：「我命令全軍各級要強化練兵備戰，鮮明領導，堅定不移，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做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全軍指戰員，要堅決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指示。」¹⁶筆者認為，細讀習近平的全軍訓令可發現，訓令中提到要堅持按綱施訓、從嚴治訓，這是中共中央軍委首次統一組織全軍開訓動員。如果把這個開訓動員大會放在習對中共軍隊的整體改革來看，反應出他的權力與意志的結合與貫徹，更反應出他對強軍願望的強調。

肆、結論

一、研究發現

根據侯魯梁著作出版的《毛澤東建軍思想概論》指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毛澤東建軍思想產生和形成最重要的時期，中共許多建軍的基本原則，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在 1927 年 9 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的三灣村，針對當時中共軍隊的思想混亂，紀律鬆弛，軍閥作風嚴重的情況，毛澤東對部隊進行了整編。黨支部建立在連上，設立黨代表制度，排有黨小組，班有黨員；而營、團以上則設有黨委，全軍由毛澤東任領導前委，從而更加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侯魯梁，1993：5)。

1929 年 12 月，毛澤東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中共紅 4 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並通過了毛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此即為在中共建軍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侯魯梁，1993：5)。這次會議確立了「黨指揮槍」，根據中共紅四軍當時存在的問題，確立的政治建軍的原則，鑄就了中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政治建軍的核心要義，就是確保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關於這部分，筆者認為，習近平在 2014 年於福建省古田鎮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時強調「古田精神」時可見一斑。上述兩次會議的決議解決了中共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

¹⁶ 中央軍委舉行 2018 年開訓動員大會，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人民網》，2018 年 1 月 4 日，〈<https://PRC.people.com.cn/BIG5/n1/2018/0104/c64094-29744164.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9 日)。

成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紅軍(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同時，這個決議為整個共產黨的建設確立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也是共產黨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侯魯梁，1993：5)。

另外，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一書中可看出，中共多次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重視「古田會議」的精神，其中於 1960 年 9 至 10 月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為政治思想工作問題。《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總結了中共歷史上政治工作的成就，認為古田會議所確定的建軍原則在中共建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共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決議》中提出中共軍隊的建設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方針，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加強共軍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軍隊建設指導思想，軍隊的政治工作應當繼續貫徹執行古田會議的路線(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2000：300-331)。

筆者認為，中共堅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除了是毛澤東軍隊建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外，也是中共在軍隊建設上所堅持的根本原則。據一份文獻資料顯示，毛澤東在創建中共軍隊中，不僅確立並始終堅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中構成這一思想主體的有三個方面：(一)黨指揮槍的原則，大力加強軍隊對於黨的建設，實行黨委統一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二)大力加強軍隊黨的建設，為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提供組織保證；(三)實行黨委統一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則是堅持黨指揮槍的基本制度和途徑(侯魯梁，1993：47)。

毛澤東也曾在中共第 6 屆中央委員會第 6 次全體會議上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容許槍指揮黨(侯魯梁，1993：47)。」也就表示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共產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共產黨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軍隊實施全面領導，中共軍隊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侯魯梁，1993：47-48)。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黨章、國防法、《政工條例》等規範中，均明訂黨對軍隊的領導，尤其《政工條例》第四條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潘進章，2015：38)。」

研究發現，習近平上任之後，一再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強調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習曾說，「蘇聯解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蘇共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把軍隊思想搞亂了(潘進章，2015：54-55)。」由此可看出中共對全軍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習要求共軍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權威，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指揮，以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潘進章，2015：56)。必須指出的是，2017年7月30日於「朱日和」基地習於「慶祝建軍90周年」那場大閱兵，受閱官兵由「首長好」改為「主席好」，實現了習主政後的「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制度(希望之聲，2019)。

二、會議精神

從歷史來看，中共的歷任領導人，為因應中國大陸內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勢的變化與社會環境變遷，均會適時提出指導思想，以鞏固軍權，樹立個人的領導權威。例如在中共第十九大黨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已經更加掌握中國共產黨體制，並且鞏固自身權力，其中他的名字與意識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內，這是僅有毛澤東才有的殊榮。

誠如前文所提，於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在古田主持第一次中共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強軍之魂，鑄牢軍魂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楊祖榮，2014：特刊)。」筆者認為中共之所以重視古田會議，提到「鑄牢軍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強軍之魂，鑄牢軍魂是軍隊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務。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必須堅持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落地生根。」主要目的是，「貫徹整風精神，研究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的重大問題(周朝榮，2017：版1)。」

2017年10月26日習近平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軍隊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從這一段談話內容不難看出習特別注重對軍隊的領導，強調軍隊對共產黨的忠誠。另外，依據2015年中共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亦提到，「適應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堅持走軍民融合式發展道路，積極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使軍隊始終成為

黨鞏固執政地位的中堅力量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可靠力量(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即可看出中共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中一項目的，旨在建立一支聽黨指揮的軍隊。

筆者認為，中共在習近平主政下已朝向一個新時代前進。對外部分，中共表示目前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國家所創，而中共企望的是一個將來更適合其自身國家利益的秩序，也因此習提出「中國夢、強軍夢」的說法，就是驗證其企圖建立一個能與大國相抗衡的軍事強權；對內，習近平更加獨攬大權，這部分可由我國國防安全研究院李哲全博士於《習近平黨政軍決策機制》研究報告中指出，習近平集權作為如下：

(一)以「改革」鞏固權力：透過反腐肅貪、幹部能上能下規定等政策與行政手段，汰除政敵與不適任官員，鞏固地位建立權威。

(二)藉「領導小組」擴權：習成立了很多新的「小組」，並擔任組長，架空原本屬於國務院等機構的權力。目前習至少身兼 15 個頭銜¹⁷。

(三)習家軍進佔黨政軍要職：常委會、政治局、中央軍委、重要部委、省市區書記等。

(四)從集體領導到個人集權：18 屆 6 中全會提出「習核心」，19 大將習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取消國家主席兩任限制、打破「隔代欽點」慣例(19 大沒有接班人進入常委會)¹⁸。

值得關注的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至西點軍校演說稿《習近平的世界觀》中也提到，習近平的世界觀更加強調共產黨的中心性，其凌駕國家專業組織之上，以及共黨意識形態勝過政策實用主義。在數十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功能曾一度限縮且被嚴格限定成僅扮演意識形態的角色，但情況現已不復如此。習近平明白如果繼續將共產黨從與國家真正決策發展過程中密切相關的機構中去除掉，終將導致其權力逐漸褪蝕，因此習積極的介入，意圖

¹⁷ 習的 15 個頭銜(含小組、委員會)計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中共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軍委、中共國家軍委、中國國家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財經委員會等單位。筆者根據國防院李哲全博士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國防大學學術專題講演《習近平黨政軍決策機制》內容中摘錄，頁 14。

¹⁸ 筆者根據國防院李哲全博士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國防大學學術專題講演《習近平黨政軍決策機制》內容中摘錄，頁 13。

扭轉此一趨勢(Kevin Rodd, 2018: 18-19)。

總結此篇研究，筆者認為，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這些整體趨勢線會變得更加明顯。中共於 1949 年後的政策：從毛澤東的國家政治革命、鄧小平的經濟現代化，到習近平的中國在世界舞台崛起的願景。鑑此，此篇文章後續要持續研究的是，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如何與中共打交道，才是問題核心所在，而其以「思想領黨、政治建軍」將會是中共繼續鞏固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Kevin Rodd, 2018: 23)。當此條件遭受威脅或動搖時，對於中共甚或臺灣或世界局勢會產生何種影響或變化，更是筆者後續要持續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87)。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官德、劉承宗、李化成合著(2003)。中國共產黨史。臺北：五南出版社。
- 王朝彬著(1997)。毛澤東政權思想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侯魯梁著(1993)。毛澤東建軍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1997)。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2000)。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蔡國裕(1988)。中共黨史第一冊-上海、瑞金時期。臺北：國史館。

二、期刊

- 潘進章(2015)。習近平對共軍政治工作指導之探討。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 卷第 3 期，頁 47-60。
- Kevin Rodd 著，章昌文譯(2018)。習近平的世界觀(How Xi Jinping View the World)。國防譯粹，第 45 卷第 9 期，頁 17-23。

三、網頁

- 人民網(2019)。中共認為古田是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地方，也是政治工作奠基及軍隊定型的地方。人民網：
<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F%A4%E7%E4%BC%9A%E8%AE%AE/15992803>，檢索日期：2018.11.10。
- 人民網(2019)。黨指揮槍的原則。人民網：
<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5%9A%E6%8C%87%E6%8C%A5%>

影響中共以黨領軍的兩次會議－以三灣改編會議及古田會議為例

E6%9E%AA。檢索日期：2018.11.10。

人民網(2019)。古田會議(2014 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人民網：
<https://cpc.people.com.cn/item/%E5%8F%A4%E7%94%B0%E4%BC%9A%E8%AE%AE/15992803>。檢索日期：2018.11.10。

人民網(2019)。習近平 2017 年 10 月 26 日出席北京召開的軍隊領導幹部會議。人民網：
<https://cpc.people.com.cn/2017/10/26/ARTIXqZlAdd6Nfj3UXGUUpDBE171026.shtml>。檢索日期：2018.11.10。

人民網(2019)。中央軍委舉行 2018 年開訓動員大會，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人民網：
<https://PRC.people.com.cn/BIG5/n1/2018/0104/c64094-29744164.html>。檢索日期：2019.1.29。

希望之聲(2019)。非常時期，習近平「八一」內蒙閱兵破五大常規。希望之聲：
<https://soundofhope.org/b5/2017/07/30/n964100.html>。檢索日期：2019.1.29。

四、報紙

楊祖榮(2014.10.31)。弘揚古田會議精神－增強政治工作時代性感召力。解放軍報，特刊。

周朝榮(2017.10.26)。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而奮鬥。解放軍報，版 1。